

周易新论

宋祚胤 著

周易新论

(附《周易》原文) 宋祚胤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论《周易》的写作时代	(7)
一 西周初年说	(7)
二 战国初年说	(18)
三 西周末年说	(34)
第二章 论《周易》的研究方法	(53)
一 春秋时代的研究方法	(54)
二 战国时代的研究方法	(68)
三 当代的研究方法	(89)
四 应该采取的正确研究方法	(98)
第三章 论《周易》的宇宙观	(106)
一 本体论	(106)
二 方法论	(119)
三 认识论	(128)
四 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周易》的宇宙观	(129)
五 《周易》宇宙观在先秦哲学思想发展 史上的承先启后作用	(133)
第四章 论《周易》的政治观	(147)

一	基本观点.....	(149)
二	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	(164)
三	“孚”与“德”和“中行”的作用.....	(175)
四	《周易》政治观在先秦政治思想发展 史上的承先启后作用.....	(181)
附录	周易.....	(193)

前 言

我五十多年前开始读《周易》，只稍能上口，对意义毫无所知。进大学后专门学《周易》，理解仍很模糊。后来集中时间和精力读先秦诸子，想钻研《周易》的思想逐渐强烈。因为我初步意识到，先秦诸子的几个重要学派都受《周易》影响，不去读懂它，就很难看出这个时期思想的源流正变。于是就逐卦逐爻读，反来复去读，认识也就逐步加深。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激励下，我也想争取贡献一得之愚，于是写成了这部《周易新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任何事物都必须弄清楚它的历史条件。《周易》不能象传统所讲的是写成在西周初年，近人的战国初年说，论据和论证也很不充分。由于它的文辞形式有些与作于西周末年的《诗经·小雅》中的比兴诗歌类似，不少卦又确实体现了西周末年君王与权臣和诸侯之间的激烈的斗争，甚至接触到厉王末年的重大历史事实，加上作为宇宙两种基本功能的阴阳，要到宣王初年才有人用文字写出来，在《周易》却还没有。那么要说《周易》主要是在厉王末年写成，就有了比较充足的理由。

《周易》在先秦典籍中很难读懂，这固然是由于它的文辞简古和某些史实难明，但更重要的还是长期以来，在研究方法上出了问题。

《周易》问世不久，到春秋初年，就被当时的史官们通过变卦，把它用于占筮。变卦在《周易》毫无根据，因为书中始终没有提到，只能说是外加的。它不仅使卦与卦之间出现本来所没有的联系，还使每一个卦其余的爻辞失去意义，并彼此孤立，互不相关。这就使《周易》长期以来被人看成是占筮之书，竟如同“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①。

战国时代的“十翼”（《易传》），对《周易》也存在许多错误理解。它认为爻的位次可以分为奇数和偶数，并分别与阳爻和阴爻有本质的联系，而且居于内外卦奇次和偶次的爻还相互呼应。又认为无论内卦和外卦，只要是居于中间那个位次的爻就最吉利。而且六个爻还能够彼此调换位次，甚至中间四个爻还可以组成在一个卦之中的两个新卦。于是在变卦说以外，又搞出一套与研究《周易》全不相干的爻位说、相应说、得中说、卦变说、互体说以及它们的相互结合。这些对研究《周易》也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当代有些人由于仍然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并严格遵奉“灵签符咒”说，就把卦象完全置于不顾，只对

①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卦辞和爻辞作出孤立的解释。这也使每卦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和全书还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周易》受到割裂，使人无从得其原意。

我认为，要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就要扫除以上的烟雾迷离之说，完全从《周易》的卦象、卦辞、爻辞和它们的相互联系出发来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零星片断地在出现，今天不但要认真地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还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加以探讨。这样，就会形成一套研究《周易》的正确方法。

明确了时代背景，掌握了正确研究方法，对《周易》的宇宙观和政治观，就有了进行探索的可能。

先看宇宙观。

《周易》把从殷代到西周初年流传下来的原始客观唯心主义天命论引到了坚定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一次重大发展。尽管与以前一样，《周易》的“孚”（诚）也从天得来，但作用却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无论是人世和宇宙间的一切，“孚”都能够加以解决，从而演化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本体，并非常坚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还从“孚”产生“道”，从“道”产生天地方物。尽管在表述上极不完备，但结合以阴阳爻构成天地方物，阴阳爻还要归结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又受到“孚”的制约看，其哲学的性质仍然相当清楚。这就从坚定的主观唯心主义萌生出

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出现了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一次崭新的发展。由于“道”生万物，万物归于“道”，周流不停，就出现了机械循环论。由于万物归于“道”以后还要依附于“孚”，就出现了唯心论的先验论。但在从“道”生物和物归于“道”的过程中，毕竟还有许多物在运动，于是就有了比较丰富的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唯物因素和套住在形而上学框子里的辩证因素，以及在唯心论先验论前提下的唯物论反映论。这些也都是前所未有的。

再看政治观。

《周易》用“孚”决定一切，归根到底是便于奴隶主在政治上高下在心。进一步用“道”作为宇宙本体，归根到底是替奴隶主的胡作非为找出一个至高无上的根据。而事物既然都在循环，西周王朝当然也在循环，即强盛了就会走向衰落，衰落了也会恢复强盛，于是西周初年奴隶制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但这毕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能够徒托空言，所以《周易》又为西周末年的君王制定了一套战略思想，要他们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还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策略思想，要他们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来适合当时王朝衰微的处境。这些主张虽然也来自前人，例如西周初年就有人提到了，不过还只是偶然出现。而《周易》却体现得相当系统，相当完整，并且既拿来用于战争，更拿来用于怀柔，是全面加以发展的。

《周易》宇宙观和政治观对前人有很大发展，对后人

也有很多启发。在《周易》中，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缺少许多必要的中间环节，到老聃才一一补出来；而机械循环论和唯心论先验论，老聃也讲得更加明白、具体。至于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老聃也反复作了阐述，是更加系统，更加完整的。因此道家是《周易》直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到庄周也还没有大的改变。孔丘只继承了《周易》的原始客观唯心主义天命论，到晚年才有一点主观唯心主义。子思继承了《周易》的原始客观唯心主义，又发展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并达到了彻底的程度。至于机械循环论和唯心论先验论，就只是简单地加以重复。在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方面，孔丘和子思对《周易》的继承都不多。但《论语》讲“无为而治”，《中庸》讲“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可见并非全无继承。因此儒家是《周易》的旁支，到孟轲和荀况也还没有大的改变。法家韩非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与《周易》有很大的不同，但他早年却沿袭了老聃的“道”，也显示出受到《周易》的影响。由此可见，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周易》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殷代和西周初年奴隶主阶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就去脉不明，春秋战国时代几个重要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也来龙不清。这在先秦思想演进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直到目前为止，事实上也正是存在着这样的缺口。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力图把这个缺口填补起来，使先秦思想的历史进程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寻。

《周易》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后世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特别是它的以八种自然物构成宇宙和运动变化的观点，影响尤其深刻。而机械循环论则是唯物辩证法螺旋式运动的理论先驱，其意义更加不容忽视。至于那些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当新生力量还处在弱小地位的时候，也是可以作为借鉴的。

本书写成以后，曾向海内同行专家们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但由于本人才、学、识平庸，书中缺点和错误必定不少，衷心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第一章 论《周易》的写作时代

关于《周易》的写作时代，是一个争论较多，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一共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写成于西周初年；第二种是写成于战国初年；第三种是写成于西周末年。由于判定《周易》的写作时代与明确《周易》的宇宙观和政治观的基本实质及其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先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是很必要的。

一 西周初年说

说《周易》作于西周初年，这是两千多年以来的传统说法，但又有错综复杂的情况。

1. 伏羲画卦、重卦，或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并作出卦辞、爻辞。

《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乾（☰）、坤（☷）、

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是由远古的一个帝王伏羲氏画出来的^①。关于这一点，以前的人倒是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在把八卦通过排列组合，以演化成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上，却有了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伏羲既画出八卦，又把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例如《淮南子要略》：“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

另一种认为，伏羲只画出八卦，到西周初年的文王，才把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例如《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氏作《易》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

至于郑玄说神农重卦，孙盛说夏禹重卦，就都是模模糊糊的，即使是以前的人，也绝大部分不肯相信。

从上述情况看来，由谁重卦，在西汉初年，意见确实有不同。可是到了后来，文王重卦说却逐渐占了上风。不仅如此，还说他替六十四卦作了卦辞，替三百八十四爻作了爻辞。例如《汉书·艺文志》：“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虽然还是沿袭着《周易·系辞下传》第七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和“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的提法，但已经从比较委

① 伏羲氏即包羲氏，古无轻唇音，“伏”字读如“包”字。

婉游移，转变成非常肯定、具体了。

2. 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

以前有些学者，如马融和陆绩等人，都认为爻辞里有某些事是出现在文王以后，文王不可能预先知道并且拿来作为写作爻辞的材料。因此他们说，文王只写成卦辞，没有写出爻辞。其证据是：

(1) 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享）于岐山。”这里的“王”以前一般认为是指周文王，如果爻辞是文王作的，就不应该这样写。因为他被迫称为王，是在武王灭商以后；而且即使早已称王，也不能用第三人称来表述自己。

(2) 明夷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这是说箕子为商纣王所囚禁，并且罚作奴隶，因为“明夷”是说光辉的品德受到损害。可是这件事却发生在武王载文王木主以观兵于孟津以后，文王也不可能在事先运用。

(3) 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这里的解释历来是：“东邻”指商纣王，“西邻”指周文王。如果爻辞是文王所作，那么象他这样一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①的人，就决不会去与商纣王分庭抗礼；何况还要凌驾在他之上，认为他的大祭还赶不上自己的薄祭呢？

马融和陆绩等人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引用了以下一些材料作为依据。

①：《论语·泰伯》。

《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他们认为把“易象”与“周公之德”相联系，就是爻辞作于周公的充足理由。后来《易乾凿度》说：“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师于姬昌，法旦。”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京氏易积算法》说：“夫子曰：‘圣理元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就又都通过孔丘，把卦辞和爻辞的著作权分别归于“西伯父子”——姬昌和姬旦，文王和周公。而卦辞既然是文王所作，那么爻辞是周公所作，就该是当然的事了。

此外，如果要再寻找根据，还可以搬出《尚书·洪范》的“贞、悔”。“贞、悔”是把《周易》六十四卦运用于占筮的两个专门名词。其情况是：在占筮的时候，如果所得的只是一个不变的卦，那内卦就叫做“贞”，外卦就叫做“悔”。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战斗开始以前，秦穆公叫卜徒父占了一次卦来预卜吉凶。结果是“其卦遇蛊（䷑）”。而解释是：“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这是说，蛊卦的内卦是象征着风的巽卦（䷸），外卦是象征着山的艮卦（䷳），也就是用“贞”指内卦，用“悔”指外卦。而如果所得的是从一个卦转变成为另外一个卦，那没有转变以前的卦就叫做“贞”，转变以后的卦就做“悔”。例如《国语·晋语》四有这样的故事：晋公子重耳出亡在外，辗转来到秦国，秦穆公很重视他，

这使他要取得晋国的信心大大加强，于是亲自占了一次卦，得到“贞屯悔豫”——卦象从屯卦(䷂)转变成为豫卦(䷏)。这就是用“贞”指没有转变以前的屯卦，用“悔”指转变以后的豫卦。从传统说法看，《洪范》写成在周武王十三年，因为序言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既然在那个时候就涉及到运用《周易》来进行占筮，而且司空季子对“贞屯悔豫”的解释又是“是在《周易》，皆‘利建侯’”，而“利建侯”又分别出现在屯卦卦辞的“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和初九爻辞的“盘桓，利居贞，利建侯”以及豫卦卦辞的“利建侯，行师”当中。这就说明，把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各有卦辞，三百八十四爻又各有爻辞，这些至迟在西周初年都已经完成。再加上从现在所保存的商代文献中又找不到有关用《周易》来进行占筮的记载，那么《洪范》的“贞、悔”就足以证明，《周易》的写成最早也只能是在西周初年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卦辞和爻辞是由谁写成的，虽然还有一点争议，但都认为无非是出于“西伯父子”之手。于是《周易》作于西周初年说就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以至统治着《周易》的研究领域达两千年左右。

然而，对伏羲画卦的说法，后人有着充足的理由说明它是不可靠的。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①对这一点尤

① 原名《周易的构成时代》。

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意见。其大旨是：

(1)伏羲画卦，到《周易·系辞下传》才第一次见于文字，在先秦典籍中没有任何根据，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2)伏羲是以前学者用来表示人类社会进程的虚构人物，要说由他画卦，自然绝对没有可能，因为这是在虚构之中又加上一重虚构。

既然八卦不能够为伏羲所画，那么要再说由他重卦，就更加讲不通了。

至于文王重卦并作出卦辞和爻辞的问题，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中也提出了一些很有道理的看法。其大旨是：

(1)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在重卦说的前面用了“盖”字，可见是一种推测之辞^①。

(2)文王不过是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他自己还在看牛放马，种田打谷，所谓“伯昌号(荷)蓑(蓑)，秉鞭作牧”^②，“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③。要说凭这样的人就能够写出一部《周易》，也难以令人信从。

至于周公作爻辞的问题，苏蒿坪在《周易通义附录》

① 张守节《史记正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应该是郭氏之所本。

② 《楚辞·天问》。

③ 《尚书·无逸》。

中已经给予了驳斥。苏氏指出：“《易》象属周故号《周易》。宣子以周公与周并言，原非专美周公也。”此说洞中肯綮，很有说服力。

经过郭、苏两氏的摧陷廓清，一切传统的有关伏羲画卦、重卦，或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出卦辞、爻辞，或文王只作出卦辞、另外由周公作出爻辞，这一系列提法就都不能成立了。至于《尚书·洪范》中谈到的“贞”和“悔”的问题，那就还要作些分析，才能明白。

从常理说，如果“贞、悔”说可以相信，那么从目前还保存得比较完整而且没有受到后来学者怀疑的那些周代文献中，就应当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有运用《周易》来进行占筮的情况，因为当时西周王朝统治者还是很相信天，很依赖天的。那么要他们不想办法沟通天人，预占吉凶，便成为不可能。而且，《周易》如果是他们开国“圣人”的一项重大创造发明，就更应该拿来运用，以代替殷代的龟卜，并把它当作革新的重要标志。可是很奇怪，《尚书》的《金縢》、《大诰》和《洛诰》等篇，大量运用的还是龟卜，不是占筮。即使在《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和《顾命》等篇中，虽然没有讲到龟卜，但也没有涉及占筮。只有《君奭》说过“若卜筮，罔不是孚”，可是这个“筮”也并没有与《周易》联系起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诰》还说过“宁王惟卜用”和“宁王遗我大宝龟”。这两个“宁王”